

0810

勃利文史資料

第八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勃利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勃利文史資料

第八輯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勃利县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 部 发 行
勃 利 文 史 资 料
第 八 辑

出版单位：勃利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承印厂：勃利县印刷厂

出版日期：1991年12月 印数：2,000

开本32 字数160千 印张8 插页4

黑新出图(1991)469号 工本费3.00元

EA70/44

政协勃利县七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任：宋积东

副主任：于宽洪 程中元

委员：王风义 王信吉 曲江 江德达 刘明
李阪用 胡俊池 傅蕴琪

顾问：蔡运杰

责任编辑：于宽洪

编辑：权琅轩

封面设计：季格君

封面题字：程中元

附：

政协勃利县六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任：赵连城

副主任：于宽洪 李瑞启

委员：王信吉 王室良 江德达 刘明 李平泉
李阪用 李书谦 张尧 张赤军 胡俊池
傅蕴琪 穆恩山



半世紀ぶり懐かし

北大同

戰爭

中國人留学生・田谷(80)を囲む宴い

田谷春同志访问日本北海道母校时，日本同窗在札幌市内“桑扶拉瓦”宾馆集会欢迎。中立者为田谷春同志。

摘自1987年10月28日《北海道新闻》

第三回

80歳の中国人留学生

キノコ入り 淡泊な味

店主の四男と
札幌で対面

田 谷 春 同 志

（前編）

田 谷 春 同 志

（後編）

（中編）

（次回）

田谷春同志在日本留学时，常去札幌市内一家食堂吃“辣面”。这次访问与店主的四儿子大久昌巳先生会面了。大久先生感谢田谷春同志在战后关照日本孤儿之情，特送给田谷春同志一架高级花镜。这是大久先生在给田老（坐着）调试眼镜。

摘自 1987年11月1日《朝日新闻》

目 录

李先念同志在勃利车站	白万真(1)
原秋夫妇在勃利	权琅轩(3)
建国初期与邻县划界实录	曹静波(35)
忆合江前线慰问团	钟 杰(42)
赵振东匪旅覆灭记	王崇有 张 发(45)
三十年代初期的勃利“四害”	柳弘毅(62)
勃利县新起街土改片断	王继尧(80)
偏脸子误会仗的前前后后	曹静波(90)
在重建互助水库的岁月里	蔡运杰(104)
南烧锅	齐耀祖(119)
“包”字号今昔	张 发 于宽洪(139)
忆德泰昌金银首饰店	伊才富(149)
建国前的勃利一中	钟 杰(161)
回忆解放初期的小五站儿童文艺宣传队	翟万良(175)
田谷春传记	刘成贵(181)
附：田谷春同志给勃利县政协领导的信	(246)

李先念同志在勃利车站

白万真

1978年8月下旬，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同志在视察佳木斯之后，经牡丹江回哈尔滨路过勃利时，曾在勃利车站作暂短的停留。接见了勃利县委几位书记，并作了重要讲话，给勃利县人民以很大鼓舞。

在李副主席途经勃利的头一天，合江地委办公室电话通知勃利县委，让县委书记、副书记都到车站，等待李副主席接见。

来的那天早8点钟，县委书记杨捷、副书记韩斌和我，来到勃利火车站等候。李副主席乘坐的专列9时15分从佳木斯方向开来，我们三人一起到月台上迎接。在车停稳之后，首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志和黑龙江省委书记王金籽同志从前边车厢下来。看见我们之后，省委书记王金籽同志转身向我们介绍说：“这是李德生同志”。李德生同志一边和我们握手，一边说：“你们好”！我们说“首长好”。然后李德生同志用手指向后边车厢说：“李副主席在后边车厢”，并带我们往后走。还没有走到李副主席坐的车厢，就看见李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同志一起从车上下来，向我们招手。当走近时，李副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

李副主席对勃利县这个名字感到不解，便问我们：“勃

利是什么意思？”因1958年我在团中央开会时，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在参加黑龙江组讨论时说：“你们勃利那两个字是满语的译音，意思是幸福”。因此我便随口回答：“勃利这两个字满语是幸福的意思”。李副主席点了点头。然后，李副主席问了勃利县有多少人口、多少土地、亩产多少、人均收入多少等情况。我们一一回答后，李副主席说：“你们这个县土质很好，黑油油的，但产量不高啊！主要是农田基本建设搞的还不过硬，一定要把水利工程搞好，多植树。这两项搞好了，产量自然会上去。”这时李德生同志说：“李副主席您和基层的干部留个影吧？”李副主席说：“在那照啊？”王金籽同志说：“就在车站照吧”！李德生同志高喊：“记者快来！”新华社记者来了，李副主席、陈永贵同志和我们县里的同志站在一起照了像。合影刚结束，李副主席的秘书就喊李副主席上车。李副主席上车后，站在车门口向我们热情招手。火车徐徐开动，我们举起双手欢送李副主席。

陪同李副主席的省革委会副主任、合江地委第一书记孙予元同志、合江地委书记郭献壁同志，一直送到牡丹江地区界内，在青山车站下车，勃利县委去车接回勃利。

李副主席走后，县委根据李副主席指示精神，制定了五年农业基本建设规划。主要是修建桃山水库，增加水田面积38万亩。（1979年中央决定水库缓建。）规划搞防护林带400延长公里。即县与县、社与社、村与村之间的道路修好，两旁植上树，做防护林骨架。这项工程到1982年基本建成。李副主席的简短指示，为我县农田基本建设指明了方向。

原秋夫妇在勃利

权浪轩

抗战胜利后，原秋、张英夫妇，在延安接受组织派遣，到东北开辟新区。在勃利地区生活战斗了整整四年。为勃利人民的翻身解放，恢复发展生产及开展建党建政等各项革命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给勃利人民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受到了勃利人民深情的怀念。

原秋同志是1946年12月来到勃利双河地区的。当时，双河还是依兰县辖。1947年春，根据当时革命斗争的形势需要，上级决定，建立双河县，辖今勃利县双河镇、吉兴乡、永顺乡、恒太乡及大四站乡吉兴河以北诸村屯。

1948年4月，双河县撤消县治，归并到勃利县，成立双河中心区，原秋同志任区委书记。1948年8月，原秋同志调任勃利县委组织部长。9月，任勃利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不久，县委书记王大军同志患病赴省治疗，原秋同志主持县委工作。1949年5月，任县委书记兼县长。7月，刘铁石同志任勃利县县长，原秋同志任县委书记。1950年末调离勃利。

张英同志，先于原秋同志到达合江省佳木斯。开始在驻合江东北日报社做校对工作。1947年10月，调任双河县吉兴区区委委员。1948年4月，任勃利县双河中心区

区委委员。9月，调任勃利县妇委副书记。1949年8月，调任勃利县城关区委副书记。1950年2月，任勃利县妇委书记。1951年2月，调离勃利。

原秋同志，是解放初期党派到双河地区开辟工作的最早的一批老干部之一。

双河原名二道河子，是勃利到依兰之间的一个较大的集镇。有居民近一千户。绝大多数人家，生活都很贫苦。双河地理位置很重要。有公路北通依兰，南通勃利，西通刁翎和林口县，东通吉兴和倭肯火车站。日伪时期，北门外修有军用飞机场，有日本驻军。双河镇内有小型工商业，计有八家商店，五家饭店，二家果子铺，一家车旅店。另外还有一家纸厂，一家油厂，二家酒厂，规模都不大。还有三家铁匠铺，三家木匠铺，两家中药店。当时的伪满机构除村公所外，还有警察分驻所，电话中转站等。

解放初期，张雨新匪部常在双河一带活动。吉兴一带则是刘喜山匪部活动的老巢。匪首刘喜山的家，就住在吉兴的长和屯。他们在双河、吉兴一带蹂躏乡民，强向群众摊派钱粮物资，与当地地主豪绅，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造谣破坏，反对共产党、八路军。我合江军区剿匪部队，在方强司令员亲自指挥下，连续在双河、吉兴等地打了几个大胜仗。张雨新残部逃到刁翎以西，刘喜山残部逃到倭肯河以东，潜藏在荒山野岭间。但仍有小股匪徒，窜回村屯骚扰。当时，各村屯的基本群众都还没有发动起来，一些出头露面和我们打交道的办事人员，大都是地主富农的亲亲故故或与

地主富农有关系的人。他们代表着地主富农的利益，表面上应酬接待我们，暗地里向地主富农通风报信。一般的人民群众，都不敢接近我们。

原秋同志是只身一人到达双河的。在原秋同志到达双河前的十多天，依兰县委宣传部长丁江带了一个十多人的土改工作队到了双河。还有林江同志，当时名叫林英，是部队下来的，被任命为双河区区长。其余十几个人都是在依兰县就地招收的，人员成份比较复杂。一位叫王志清的带领五、六个人进驻董大窝棚；丁江带领七、八个同志进驻吉兴区的相阁屯。原秋同志到达双河后，根据工作需要，立即赶赴董大窝棚领导土改工作。

原秋同志进点后发现，几名土改工作队员，全是新参加工作的同志，而且多数人政治历史出身有些问题。带队的王志清是伪职员。一个姓沙的大家都叫他老沙头的是国民党员，正统观念很深。另外一个姓韩的，是伪国高的学生。一个姓张的当过伪国兵。还有一个人是“国兵漏”。另有一个女的叫张国英。这些工作人员，出身不同，穿着也各异。有穿伪国兵服的，有穿便服的。带队的王志清，穿着牛皮靴、马裤，带着眼镜，神气十足。那名女同志张国英穿着还较俭朴。

村里的办事人员是地主、伪屯长邵奎山。工作队被安排住在中农王月文家，由王家给工作队做饭吃。工作队进点十多天了，还浮在上面深入不下去。群众都不敢靠近工作队。工作队的工作非常被动。每天有人把工作队的活动，报告给地主富农。工作队夜晚开会也有人在窗外偷听。

原秋同志了解情况后认为，群众所以没有发动起来，主

要原因，一是群众对革命形势不了解，对我党我军的力量认识不足，思想有顾虑，脑子里有“怕”字。怕我们站不住脚，将来地主富农反攻倒算。另外，我们工作队员没有经验，不会做群众工作。于是原秋同志教给队员许多工作方法，要求工作队员都深入下去，走街串户，访贫问苦，和群众聊家常，交朋友。了解那些人家生活最穷苦，那些人家苦大仇深，那些人家是基本群众，然后再进行重点的访问。

开始，群众思想有顾虑，都不敢和工作队说真话。于是，原秋同志耐心做思想工作，和苦大仇深的农民交朋友，讲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道理。当谈到伪满十四年来日本军国主义和警察特务欺压老百姓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非常热烈。但一提到本村地主剥削农民时，就不吱声了。原秋同志因势利导，从诉民族压迫苦，逐步引导群众诉阶级压迫苦，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在进行阶级教育的同时，还对群众进行形势教育。宣传全国革命的大好形势，坚定广大群众跟着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信心和决心。

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不少群众开始向工作队靠拢，特别是苦大仇深，深受封建主义剥削压迫的王富阳、李福恒、老苏头、潘德录、侯德山等人，他们都主动向工作队反映情况，成为土改斗争的第一批积极分子。

王富阳等几个贫雇农积极分子，每天都在贫苦农民中积极开展活动，把工作队教给他们的道理讲给大家听。告诉大家，工作队是来帮助咱穷人斗地主闹翻身的，共产党、八路军不仅能站住东北，还要解放全中国。他们还把一些农民领到工作队住处由工作队员进行谈话教育。团结教育面越来越

广。很快又有吕福增、张振芳、张万富、李洪录、李云、李佩林、李洪才、郭丙文、曹大包等一大批贫雇农积极分子涌现出来。曹大包家里很穷，过去耳后长个大包，有一次冬天给地主干活，喝了点酒，又受寒冷刺激，用手一抹，把耳后的大包抹掉了。但还是留下了曹大包的绰号。他们都和原秋同志结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几乎天天都和原秋同志在一起。妇女群众中也出现了孙秀岩媳妇、郭丙文媳妇和顾乃吉媳妇冯桂珍等几个贫雇农积极分子。她们也都积极靠近工作队，在工作队指导下，做妇女的教育发动工作。特别是冯桂珍，娘家住双河街里，家境很穷苦，受尽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有朴素的无产阶级觉悟。但她的公公和丈夫都还由于思想认识没有提高，阻挠她接近工作队。冯桂珍革命意志很坚决，为了减少家庭阻力。她每天都先把家务事尽力做好，然后再外出帮助工作队做群众工作。她家住三间草房，工作队有时就利用她家找群众谈话。每当这时，冯桂珍同志总是坐在外间门口放哨，防止坏人窃听。工作队还在群众中开展教歌活动，对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张国英很爱唱歌，她教给群众不少革命歌曲。

在群众工作有了初步进展之后，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原秋同志决定留下两三人住在原处，其余几个同志都分散住到政治上比较可靠的贫雇农家里，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李福恒家人口较多，原秋同志就同他家男的挤在一铺南炕上住。这时，工作队和群众更便于接近了。工作队员每天都在群众中开展活动。

在群众基本发动起来之后，根据斗争需要，建立了各种群众组织。首先建立了农民会。参加农会是有条件的，必

须出身好，是贫雇农或下中农，还要思想好，对土改运动有正确认识，拥护共产党。此外还成立了妇女会和儿童团。这时，有些积极分子已经搞到一些枪支，背着枪，站岗放哨，监视地主活动。更多的人，包括一些妇女和儿童，都拿着扎枪头，显得非常威武。

为了锻炼群众，教育群众，原秋同志积极组织群众，开展对地主的斗争。开始是就一人一事开小型的斗争会，把地主押到会场，就一两件事，将地主斗争后，再押回家中。通过斗争，锻炼了群众，增长了群众的智慧，也大煞了地主阶级的威风。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召开了斗争地主的群众大会。组织群众面对面地同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在斗争大会上，揭发了地主董三尖子经济上剥削穷人，手提着大棒子打人的罪行。董三尖子当场向群众低头认罪，赔礼道歉，并保证今后痛改前非。地主邵奎山也交代了自己过去当伪屯长给敌伪效劳和经济上剥削穷人的罪行。地主叶三怪靠土地出租，剥削穷人，也承认了罪行，当场向群众认罪。其他几家小地主，也都交代了过去剥削农民的罪行。所有地主都在会上表示今后遵守政府法令，接受改造，老老实实做人。

几天后，地主董三尖子，害怕群众继续斗争他，在一个夜晚，潜逃到外地。贫雇农知道后，就召开大会，斗争了他的儿子董洪生，董洪生吓得低头认罪。

土改后期，金山屯居民，检举董洪生，当土匪时和土匪发生内讧，携枪逃跑，连累了一个姓鲍的农民被土匪打死。政府查清了董洪生的罪行，将他枪决了。

在开了斗争地主大会之后，群众的斗争情绪非常高涨。农会组织群众，到地主富农家挖浮财，车马、农具、衣物、

家具，都成了农民的胜利果实。

接着，原秋同志和工作队员一起，又组织农民分配土地。农会领导具体负责分地工作。当时大家都热情地叫做“土地还家”。当贫雇农们拿着分地的牌子，插到自己的地头上时，高兴的发自肺腑的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通过土改运动，教育了群众，也锻炼了群众，涌现出一大批贫雇农积极分子。他们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事，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原秋同志经过教育培养，采取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方法，在董大窝棚发展了李福恒、王福阳、潘德录、李佩林、侯德山、李洪才等六名党员。那时还处于秘密建党时期，发展党员和召开党员会议都是秘密进行的。在董大窝棚建立了党的支部，这是双河区建立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在董大窝棚土改快结束时，离董大窝棚不远的三合屯，推选了贫雇农积极分子代表，请原秋同志帮助他们搞土改斗争。于是工作队又进驻三合屯，组织领导群众，斗争了屯子里一个姓马的地痞流氓。这个坏家伙虽然不是地主，却是屯子里的臭大爷。他欺压穷人，无恶不做。特别可恨的是他挖坟掘墓，拖死人晾尸，然后还将棺材出卖。群众对他非常愤恨，却敢怒而不敢言。群众经过斗争，认为他罪大恶极，不可饶恕，最后枪决了。

不久，工作队撤回依兰过春节。春节后王志清老沙头没有回队。原秋同志带领其余工作队员回到了董大窝棚和三合屯，听了农会干部汇报情况，布置了工作。然后工作队撤离了董大窝棚，到吉兴区的仁和屯去进行土改工作。工作队离开时，挑选了王福阳、李富恒两个贫雇农积极分子参加工

作队。这一方面是对他们继续进行教育锻炼，另一方面，由他们到群众中现身说法，更便于发动群众。

这时，丁江同志进驻的吉兴相阁屯的土改斗争，也开展得轰轰烈烈。

相阁屯，是双河吉兴一带最大的封建堡垒。有封建地主、富农十余户，最大的地主是李相阁、李相臣哥俩。李相阁已死，李相臣主持家政。他们有土地270垧，修有大院套，四角修碉堡。解放前，养着炮手看家。和伪官府、土匪都有来往。

相阁屯还有另一家地主马海龙。他的小老婆是李相臣的妹妹。他也财力雄厚。有土地70多垧，开着烧锅。在桓太和吉林省伊通县还有土地700余垧。

地主李相臣、李延范父子，都因罪行严重，态度不老实，被处以死刑。马海龙被批斗后，看押起来。马海龙的小老婆，因和群众对抗，也被打死。

贫雇农群众查抄了李相臣、马海龙的家。从李相臣家中，查抄出步枪子弹一千余发，还查抄出黄金30多两，银元600多块。由于藏放的时间长，受了潮气，银元上都生一层霉沫。还查抄出许多金银首饰，有金镏子、金银手镯、金耳环、金簪子、金项链等，在马海龙家也查抄出黄金6两6钱，还有不少值钱的衣物家具。

董大窝棚和相阁屯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大大的鼓舞了吉兴、双河一带的群众，人们互相传告：“董三尖子、李黑咀被穷人斗倒了，共产党是领导穷人闹翻身的。”一些地主忧心忡忡，提心吊胆，有的潜逃了。而一些农民群众顾虑少了，有不少人都盼望土改工作队能早到他们那里帮助搞土改。